

中国共产党 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

李方祥 著

zhongguo gongchandang yu
minzu wenhua chuantong yanjiu

当代中国出版社

ISBN 7-80092-958-2



9 787800 929588 >

ISBN 7-80092-958-2/G·568

本册定价：28.00元

中国共产党与 民族传统文化研究

李方祥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研究/李方祥 著. —当代
中国出版社, 2004. 6

ISBN 7-80092-958-2

I. 中… II. 李… III. 研究-论文-中国 IV. F53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65734 号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研究

李方祥 著

*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100009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76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2-958-2/G·568

本册定价:28.00 元

序

方祥同志的新作《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即将出版，希望我能为之写一篇序。这本书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我对此虽深感兴趣，但缺乏研究，不敢妄加评说，只能在通读全书的基础上，谈谈自己的一些体会，与作者，也与读者们共同讨论。

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应是中共党史和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值得学术界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但一直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方祥同志的这本新作较系统地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说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在书中提出的几个问题，我认为不仅饶有新意，而且令人深思。

一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反传统问题。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提出，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期以来传统与反传统两种思想倾向同时并存。这是作者提出的不同于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大家知道，海外著名学者林毓生在其《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等专著中，曾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性的反传统”的观点。这一观点发表后在学术界引出一场有关传统与反传统的激烈争论，并连带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基础上产生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也视之为反传统，甚至是“全盘性的反传统”的代表。当然，对于一个全力破坏旧世界、致力于建设新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说，人们的这种认识也无可厚非，但问题在

于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思想家，还是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在反对传统、破坏传统的同时，也有许多肯定传统的言论公诸于世。由此，对传统与反传统进行激烈辩驳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林毓生对那种“以为用考据的方式找到了一些‘五四’反传统人物肯定传统的材料，便可反驳拙著的论旨”（林毓生：《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简答王元化先生》，林毓生等：《五四：多元的反思》，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9页）的做法也很不以为然。

那么，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比较倾向于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看法，即以传统与反传统的这种简单的两极分法很难把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关系讲清楚。

从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无论是认同传统还是反对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不同发展时期都是同时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时期，由于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而使其中某一种倾向居于主导地位罢了。例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建党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代表性人物反传统的倾向比较明显。建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反传统的倾向则更是有目共睹，如文革初期的“破四旧”、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等等，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即使是在比较认同传统的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传统地位的肯定也是有原则有分寸的，没有把传统文化的作用无限拔高。据匡亚明回忆，1942年他在延安向毛泽东请教如何评价孔子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孔子生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毕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孔子的学说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当时的重庆方面正

在大搞什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毛泽东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434页）

从党的某一个具体成员来看，传统与反传统在同一个人身上也是同时并存，这种矛盾现象在党内许多代表人物中也大量存在。方祥同志在书中以王明、张闻天等曾犯过“左”倾错误的党的领导人为例，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实际上，即使是早期以反孔著称于思想界的陈独秀也存在着这种内在的矛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不仅说了一些激烈反孔的言论，同时，也在其它场合发表了一些肯定传统的精辟言论。但到了抗战时期，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学说的看法发生了较大变化，持比较客观冷静的分析态度。他说：“所有绝对的或相当的崇拜孔子的人们，倘若不愿孔子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便不应该反对我们对孔子重新评定价值。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的说有。”（陈独秀：《孔子与中国》（1937年10月1日），《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他还认为孔子的价值在于一个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另一个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封建礼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全盘打倒，而此时陈独秀对其价值则加以重新审视，认为：“我向来反对拿二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来不曾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没有价值。”（陈独秀：《孔子与中国》（1937年10月1日），《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统一体，在先秦以前是诸子百家，众说纷纭，秦汉以后逐步形成一个儒法互补并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文化系统，有的学者把这种结构特点概括为“儒表法

里”，但诸子百家学说的影响照样存在。学术界所讲的中国共产反传统，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与儒家的关系而言，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传统文化并不完全否定，比如对法家的态度与儒家就大不一样，这是因为儒家与法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不同。一般而言，儒家比较有利于统治阶级稳定阶级统治，而法家则相对而言更有利于推动社会变革。因此，当社会处于整个大转型时期，儒家就遭到贬斥，法家则受到尊崇；而当统治阶级需要稳定政治统治时，儒家就被抬得很高。还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墨家学说来说，中国共产党的评价一贯比较高，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学者就把中国古代的墨家学说视作劳动人民的学说来附会马克思主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墨家反对儒家的“礼”，主张人无贵贱、要求人类平等、反对统治阶级任意剥削和压迫。而杜国庠不仅对《墨经》中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唯物论思想特别推崇，而且还十分服膺墨家的务实精神。

由上可见，无论是笼统地判断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反传统还是继承传统，或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某一时期是反传统、另一时期是坚持传统，都是把复杂的历史事实简单化，都不能科学阐明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因此，我认为，该书提出中国共产党内长期以来传统与反传统同时并存的这一看法是值得重视，并进一步展开讨论的。

二是关于农民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作者专章探讨了农民传统与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应该说这对拓宽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也富有启发价值。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近十余年来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

的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精英文化（如传统典籍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并且已取得十分丰富且有相当深度的学术成果。然而，对中国的农民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分析却较为薄弱。国内学术界比较早提出这一研究思路的是李锐先生，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分为‘显形’与‘隐形’两种形态，前者自是经过整理修饰和官方认可的历代典籍中的意识形态，后者则是流行民间未作加工的带有习俗感情的社会心理形态，学术界一般侧重于前者，对后者重视不够。”因此他在关于如何深化毛泽东思想与民族文化传统关系的研究时，提出“从广大民众意识心态的共鸣角度，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及其曲折历史，也许会获得某种比显形文化形态的影响更深刻、更丰富、更具体的内容”。（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6-177页）李锐的这一学术见解逐渐得到党史学界的重视，并推动了一批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问世。如何萍、李维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陈卫平的《从〈实践论〉〈矛盾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但总的来说，这一课题至今仍缺乏系统的、综合的研究，特别是从宏观上对农民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梳理还不太清楚，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实现其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也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什么会产生一些扭曲的现象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而海外学者则比较重视对中国共产党与农民文化的关系研究，他们注意到了农民传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思想的深层影响，如美国著名毛泽东问题研究专家施拉姆教授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提出：“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的认识，以及他头脑中某些农民意识的影响，从20年代中期到1976年持续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之久，这些东西同他思想中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成分融为一体，

确实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各种成分彼此冲突的思想模式。”施拉姆教授提出的这个研究视角，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性，但由于他们不能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农民革命的丰富内涵，因而也无法对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的关系做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阐述，这是他们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缺陷。因此，对于海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局限性，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认真思考，从而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本身是重视农民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从事农民运动时就十分关注对“孔子之道与农民间文化的关系”的分析，他说：“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现在的乡村中，这种教育是很盛行的。”“中国自古为农业国。自秦汉以来，又多重农业，故至今特别普及乡村中，又以孔子之道，多述重农之意，历代君王，莫不尊以为法。所以农村中的教育，多趋于农业方面。而农业时代，以家为单位的，不是如欧洲各国，以个人为单位的。”（广州农讲所第六届学生冯文江听毛泽东所长讲课的笔记：《农村教育》，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页）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又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毛泽东这一论述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发。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过程中，不仅注意发掘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中那些对现时代仍有生命

力的思想资源，而且还相当重视中国农民文化传统，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以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的关系，应当重视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的结合点的研究。

农民文化传统具有革命性的一面，这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最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农村的传播不能脱离中国农村社会这一最大的现实国情。对小农心理世界的准确细致的把握，是沟通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农民的思想桥梁，因而必须了解小农的心理特点，把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文化的传播与农民的需要结合起来。中国革命既不能一下彻底斩断与农民传统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就必须利用农民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如中国农民的造反精神等，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得不迁就农民传统在短期内难以完全克服的局限。但同时又不能停留在农民的认识水平上，必须加强对小农意识的教育和改造。可见，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农民传统这一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无疑是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其次，关于小农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负面影响。

诞生于小农经济的农民文化传统既有革命性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其落后性的一面，如在经济领域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意识及其对社会主义公平的误读、在政治领域中的皇权心理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等等，这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严重扭曲，在建国后一段时期内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们党在历史上充分调动小农的革命性，从而促进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但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对小农落后性的一面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由于小农在中国革命中不是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拥护革命、参与革命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起着扭曲、变形和走样的负面作用，如绝对平

均主义与社会主义平等、禁欲主义与艰苦朴素、保守主义与自力更生、主观主义与主观能动性、个人主义与个人利益、愚忠愚勇与崇敬领袖、个人集权与集中领导、终身制与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特权制与照顾老干部、盲目服从与自觉服从等等交杂在一起，使小农意识和小生产习气与社会主义往往有些貌似神离，难以分清，这种思想倾向在毛泽东晚年显得特别突出。这当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小农意识在党内一种思想上的反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使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陈独秀，在他身上也有不少专制、个人专断等封建主义、小农意识的阴影。这些都表明了小农意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再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农民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方法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恰恰在经济文化落后、小农人口如汪洋大海般的东方国家首先建立。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农民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克服封建落后的小农意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困扰，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也是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共同的历史性课题。因此总结中国共产党处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相结合的基本经验和历史教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首先，必须正确分析农民传统具有革命性和落后性的双重性特点，特别是不能任意地拔高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其次，必须摆正批判封建主义、小农意识与批判资本主义的关系，尤其不能用落后的封建主义、小农意识来批判资本主义；再次，对于落后国家来说，改造小农意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要改变它，比改变小农的经济成份和小农的身份要困难百倍，这必须在思想上有着充分的认识；最后，改造小农意识的根本途径在于大

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从基础上改造产生小农意识的土壤。

可以说，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必须要充分了解农民传统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才能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过程的分析。

如何描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过程，这是对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关系进行历史考察的一个具体问题，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的复杂关系必须通过历史考察才能说清楚。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静态的角度，阐述中国共产党如何批判继承传统遗产，如改造了几对哲学范畴，运用了几个成语典故，等等。这当然也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但存在着一个缺陷，即无法从总体上描述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运用的历史变化过程。

可喜的是，本书作者不是静止地描述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关系，而是提出要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所谓动态的角度，就是要描述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的认识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一次性穷尽对传统的认识，而是有一个逐渐认识并不断变化的过程。

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阶段，中国共产党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农民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里，二者之间既有冲突，又有融合，还有改造的关系。农民传统具有落后性的一面，毛泽东在做农民运动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第六届农讲所上课时曾精辟地分析“农民反对新学”这个奇怪的现象，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新学的弊病”。他说：农民“所需用的教育是经济上的要求——经济的解放。从前的教科书中，多含地理、历史等知识；而现在的教科书，是居住在上海租界上的先生们编的，适合资本家的需要，与一般农民是毫

无利益的。本县的地理、历史、政治上的组织，与农民没有大关系的。而现在的小学教员，多不给农民教以这种知识，故不能供农民之需求。再关于文字方面的，如单纸、告状、田契、佃约……不能供农民之需要……”也就是说新式教育脱离农民的心理和实际需要，而私塾虽然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但“他的用费非常简单，不照资本家所设的学校，一切设备用器，均取减少。乃一桌上可坐四五个人，一凳上可坐三四人等等……又有许多的农民问题，私塾中教师可以答复的。新学校中的教员，往往不能答复的。因为教师日常多接近农民，教员与之适相反。”（广州农讲所第六届学生冯文江听毛泽东所长讲课的笔记：《农村教育》，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这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等人对农民传统早有相当的认识。

又比如，对于传统道德遗产问题，从建党前后开始直到三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摧毁旧道德代之以建立无产阶级新道德，但对于道德的历史继承性问题却缺乏从理论上做出科学回答。如1922年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在发刊词中提出：“我们现在社会里的道德，还是农业社会留存给我们的。各种事业经他们的熏染，自然是麻木不仁，所以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之以反抗的创造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发刊词》，《先驱》创刊号）此外，1926年中共北方区党组织机关报《政治生活》上登了一篇文章说：引进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不怕被人骂我们是什么舶来品，……我们所欢迎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全部。因为这些真正才算是新兴的健康的文明，才能解放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使之达到真正的平等自由的境域，才能免除未来的社会的对抗和矛盾的现象。”（希祖：《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年

7月),载《政治生活》第79期)从上述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对摧毁旧道德,建立无产阶级新道德充满信心和期望,但也表现出简单否定传统道德的情绪化反应。倒是1920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下篇《中国人之自觉》中早就说到这个问题:“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就把柏拉图抹杀吗?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去取不至谬误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1918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5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6页)可见,思想道德文化是时代性和阶级性的统一,如果排除时代所赋予的特定条件之后,其共同的精神实质或思想实质是可以继承的。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开始探索传统道德的继承性问题,出版了《论共产党员修养》、《共产主义者与道德》等一批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由上述可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选择实际上也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受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制约,因此讨论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也不能泛泛而谈,而应密切联系考察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客观条件等因素。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因党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的不同而有所侧重。

方祥同志目前还在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作为导师我很高兴地看到他学习相当刻苦用功,更高兴他通过努力不断地取得新的成果。这本新作对中国共产党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应该说已有了初步的创获,诚然,尚有些问题期待继续深入探讨。例

如，有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遗产问题以及在方法论上如何将宏观探讨与微观分析相结合，以深化对所讨论问题的认识等等，可以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愿以此与方祥同志共勉，并祝他的学业取得更大的进步。是为序。

黄顺力

2004年6月于厦大白城寓所

目 录

序	(1)
---------	-----

导论 中国共产党民族文化继承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与反传统：从海外学术话语谈起	(1)
二、学术意义与理论创新	(21)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25)
四、学术史的考察	(51)

第一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五四前后的批孔思潮

第一节 反传统：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80)
一、从潜流到激流：近代以来的评孔批儒	(81)
二、反封建：五四前后的文化抉择	(94)
第二节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转机	(104)
一、在破旧中立新	(105)
二、在中西融合中开辟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112)
第三节 在偏激与理性之间	(117)
一、偏激中的理性	(118)
二、偏激与中庸：文化选择的方法论之争	(121)

第二章 农民传统与二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节 农民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境	(146)
一、从文化运动到农民运动	(147)
二、农民传统的两极性与现代性的困厄	(152)
第二节 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与中国农民的造反精神	(165)